

浅谈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

陆冰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奉命率领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主力共9000余人由皖南转移。1月7日,途经安徽泾县茂林地区时,遭到国民党顽固派预谋部署的7个师8万余人的包围袭击。新四军指战员被迫自卫,奋勇突围,其余大部分牺牲和被俘。军长叶挺和顽军谈判被扣押。副军长项英等遭叛徒杀害。1月17日,蒋介石反诬新四军为叛军,宣布取消新四番号,声言将叶挺交“军事法庭审判”这就是蒋介石蓄意制造的震惊中外的反共事件——皖南事变。

皖南事变发生至今,对于这场事变发生的必然性问题,史学界至今仍无定论,公开发表的有关这方面的文章也不多见。为此,我想在这个问题上进行一下探讨,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有关原理,对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粗浅看法,供大家参考。

任何一个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是有原因的,在这个原因中,一部分是必然性的因果联系,一部分是偶然性的因果联系。皖南事变的发生就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同时起作用的结果。因此,要分析皖南事变的必然性问题,就必须在全局分析其原因的基础上,分辨出哪些是必然性的因果联系,哪些是偶然性的因果联系,从而作出正确的论断。

一、皖南事变的发生有其必然性

皖南事变的必然性,可作如下概括:

国民党和共产党政治、经济利益的根本冲突和不可调和,居于统治地位的国民党反动政权不容许共产党的存在,必然要置之死地而后快,这也正是阶级社会中的两大对抗阶级之间阶级之间阶级斗争不可避免的规律性。具体说来,皖南事变是新形势下,国共两党阶级斗争的必然结果。

长期以来,国共两党之间的斗争始终是阶级斗争,是争取中国革命领导权的斗争。自第一次国共合作以蒋、汪背叛革命而宣告失败以后,国共两党一直在为争取中国革命的领导权而进行长期、艰巨的斗争。从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五次围剿开始,这场斗争便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既使在日本全面侵华战争爆发以后,另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这场斗争仍在进行。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同年4月,部队在集中整编完毕后,即分兵两路挥戈东进,在大江南北发动抗日游击战争。随着抗日根据地的不断扩大和中国共产党的深得人心,使得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寝食难安,因此,借助于当时的国际形势,蒋介石便授命何应钦、白崇禧以国民政府革命军事委员会正副参谋总长的名义

发出《皓电》限令其在一个月之内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无论其听令与否，都可将其消灭，解决自己的后顾之忧，以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在皖南事变发生前夕即1940年12月10日，蒋介石向顾祝同等下达发动皖南事变的动员令，其主要内容如下：1. 为使该军（新四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德勤）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2. 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于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令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忽再宽容。不久即发生皖南事变。

国民党蒋介石总是千方百计地妄图以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的力量来达到政治上的巩固，达到自己对中国进行独裁统治的目的。所以，国民党总要或早或迟地向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发动进攻的，这是它的大地方大资产阶级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

上面阐述了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的因果联系。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必然性和偶然性同时起作用的结果，没有赤裸裸的必然性，也没有纯粹的偶然性。必然性通过偶然性来为自己开辟道路，实现自己；而必然性的背后，总是隐藏着某种偶然性。皖南事变正是上述必然性也就是规律性，在遇到了一系列偶然的具体条件下发生作用的结果。那么，这一系列偶然的因果联系又体现在哪些方面呢？这就是我要谈的第二个大问题：

二、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在皖南事变这一事件上，具有偶然性，表现为必然性起作用的具体条件。

（一）从当时的国际形势来看，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在柏林签订了军事同盟条约，积极准备扩大重新瓜分世界的法西斯战争。此后，德、意、日和英、美各国为了各自的利益，都积极拉拢蒋介石，因而，蒋介石把这个形势看作是大举反共的极好机会。特别是蒋介石通过与日、苏两国的接触，使他们的对华政策都有所转变，由此产生的影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1. 日本侵华政策的转变，使蒋介石对日态度发生动摇。

抗日战争爆发前后，侵华日军凭借其优良的装备，侵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处于暂时的优势，但于此同时，由于战线延长，兵力分散，使得日本政府军费开支剧增，人民生活日益贫困，反战情绪增长。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的迅速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广泛建立，严重威胁着日本侵华军的后方，迫使其不得不停止正面进攻。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内阁被迫改变侵华政策，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以军事进攻为辅”的方针，1938年11月，日本政府发表第二次《近卫声明》宣称：“如果国民政府能抛弃以前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成果，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之后，日本政府又发表了第三次《近卫声明》进一步以“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为诱饵，加紧引诱国民党当局投降。

由于日本的诱降和美国宣布封锁滇缅公路，切断中国的对外运输线，迫使蒋介石集团更加动摇，日蒋勾结达到顶峰。因而，自此以后，蒋介石便推行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决定设立“防共

委员会”。在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方针指导下,蒋介石集团不断制造反共摩擦,曾先后制造了“博山惨案”、“平江惨案”、“确山惨案”等流血摩擦事件多起,这就为以后进一步发动军事进攻作了准备。

2. 苏联及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转变,对国共两党产生巨大影响。

皖南事变前夕,苏、德关系日趋紧张,苏联从本国民族利益和外交政策需要出发,决定加强中苏关系,大力支持和援助蒋介石,以借蒋之力量去减轻日本帝国主义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这虽然对中国的抗战是一种支援,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助长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气焰,成为皖南事变发生的一个重要因素。主要事实是:

(1) 1940年10月16日斯大林亲自致电蒋介石,无疑抬高了蒋介石的身价,造成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国际环境。(2) 苏联派崔可夫来华任驻中国政府的武官和总军事顾问,并向国民党提供大量军援。当蒋介石接到斯大林肯定苏联援华政策的电报,摸清了苏联的底细以后,便准备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压力,这也是10月19日何应钦、白崇禧以最后通牒的形式电令八路军、新四军于一个月内开赴黄河以北指定地区的《皓电》原由。以上两点促使蒋介石下定了反共决心。(3) 共产国际的指示,在某种程度上干扰了中共中央对日趋恶化的国共关系进行准确的判断。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苏联,转变了对华政策,同时,对于中国共产党致电共产国际报告国民党反共的野心时,共产国际无理指责,干扰了中国共产党对日趋恶化的国共关系进行准确的判断,在一定程度上接受了共产国际的看法,造成了蒋介石敢于冒然发动皖南事变。

所以说,在国际新形势下,各国(特别是苏、日)对华政策的转变,助长了蒋介石的反动气焰,为其发动皖南事变提供了条件。

(二) 从国内形势来看,在国内形势诸要素中,经济上、军事上以及革命队伍内出现的右倾错误,对皖南事变的发生提供了条件、或加速其发展过程的作用。分别阐述如下:

1. 江南的经济条件以及国民党军事力量的损失,对皖南事变的发生起了加速其发展过程的作用。

皖南地处南中抗日根据地腹地,其物产丰富,交通发达,不仅在政治上、军事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有重要地位。新四军之所以能在这一地区立足、发展,其中重要因素之一是华中地区经济资源与人力、物力、财力较全国其它地区优越;而新四军成立后,蒋介石处心积虑,从军事上、经济上限制其发展;为第二次反共高潮埋下了伏笔。第一次反共高潮被打退后,国民党加紧了对新四军在经济上的限制,造成了蒋军与我军在军事和经济实力上悬殊差距。蒋的手段是多样的:(1) 控制新四军的自我发展。(2) 克扣新四军的军需供给。(3) 破坏皖南工会运动,阻止新四军发展军事经济。(4) 皖南事变前停发了新四军的军费和枪弹。但另一方面,蒋却大大增加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供给,做好围剿新四军的一切战斗准备。

由此可见,蒋介石由其反共反人民的阶级本性所决定。不会让新四军军部在皖南久

留，第二次反共高潮不可避免。

从事变发生的时间来看，与事变前新四军在黄桥战役中给国民党军事力量的严重打击有着密切的联系。1940年10月的黄桥战役，共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部队11000余人。此次战役，国民党损失较大，他们并不甘心，进一步寻求报复的机会，由此加速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从而促成此后不久爆发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因此，黄桥战役成为加速皖南事迹发生的偶然因素之一。

2. 新四军主要领导人项英所犯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以及中国共产党没能及时处理好叶、项的矛盾，为国民党发动皖南事变提供了可乘之隙，促成了皖南事变的发生。

这场事变同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右倾错误是分不开的。项英对形势做了不切实际的估计，没能及时、正确地执行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表现是：

当收到国民党的《皓电》以后，基于当时严重的反共形势，中国共产党为维护民族团结抗战大局，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和独立自主的方针，同国民党顽固派投降、分裂、倒退的行为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中共中央经过反复研究，1940年11月9日，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发出了致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对《皓电》作了公开答复。驳斥了《皓电》的造谣诬蔑；揭露了亲日派的险恶用心，抵绝其要八路军、新四军全部开到黄河以北的无理命令，同时表示为了顾全团结抗战大局，可以将皖南新四军移至长江以北。

中共中央非常关注皖南新四军的安全，多次指示皖南新四军必须在12月底以前全部北移，并指示江北和苏南新四军部队积极准备接应皖南部队。但项英却迟疑不决，1940年12月26日，中共中央致电严厉批评项英、周子昆、袁国平：你们在困难面前屡次向中央请方针，但中央远在一年前即将方针给了你们，即向北发展，向敌后发展，你们却始终借故不执行”。项英还受王明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影响，对顽固派迁就、退让、丧失警惕性，使事变的发生提供了条件。1941年1月4日晚，新四军军部和皖南部队分3路离开驻地北移。部队转移的路线经过国民党军控制的地区，实际上投入国民党反共军的包围圈。

作为新四军主要领导的叶挺、项英之间的矛盾，长期以来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由于叶挺的非党身份（脱党后）以及脱党10年的经历，加之项英的片面成见，使得项英缺乏团结叶挺，充分发挥叶挺所长的度量，使叶挺绝大部分时间有职无权。这种僵局使新四军的领导层无法坚持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以至在皖南事变过程中，他们不能一致地按中央的指示办事，导致了皖南悲剧的发生。

综上所述，皖南事变的发生，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是二者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个统一体中，国共两党阶级利益的尖锐冲突，构成了这一事物发展的基本矛盾，它决定了这一事物发展的最终结局，而当时国际国内诸多方面的因素，只是为事变的发生提供了具体的条件。